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毛澤東
《論人民民主專政》
(1949年6月30日)

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我們的祖先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但到了近代中國卻落後了。1840年6月，英國殖民者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隨後，西方列強不斷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強迫腐敗的清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從此一步步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中華民族是一個不甘屈辱的民族，中國人民是自強不息的人民，自鴉片戰爭以來就一直渴望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始終在努力尋找國家與民族的出路，探索救國救民的良方。這其中，有農民階級浴血奮戰的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有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的戊戌維新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但是，由於中國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自身的侷限性，也由於沒有科學的理論作指導，這些抗爭和奮鬥都相繼失敗了。辛亥革命後，國名雖然由「大清」改稱「中華民國」，但它不是人民的國家，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中國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狀態，國家還是那樣的孱弱，社會依舊是那樣的落後，人民依然是那樣的貧窮。

殘酷的現實促使中國先進分子覺醒。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不久改名為《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雜誌的主要撰稿人有陳獨秀、李大釗、魯

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他們基於對辛亥革命失敗的反思，認為一個新中國的出現首先必須有新思想，力圖通過思想的啟蒙促進政治的根本改變。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陸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來北大任職任教，《新青年》雜誌也從上海遷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學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反對專制和迷信；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實行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成為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

早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發表了劃時代的鉅著——《共產黨宣言》，標誌着馬克思主義正式誕生。這是一部改寫人類歷史也改變無數人命運的著作，從此，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就有了自己改造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然而，直到1899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創辦的《萬國公報》中提到馬克思和馬克思的學說後，中國人才第一次知道了馬克思的名字。後來，資產階級維新派思想家梁啟超和革命派思想家朱執信等人，都曾對馬克思的學說作過零星的介紹。但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前，馬克思主義僅僅被當作西方眾多社會主義流派中的一種介紹到中國來，並沒有將之作為一種科學的理論加以正確的闡發，更不要說被廣泛傳播。

1917年11月（俄曆10月），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開闢了人類社會新的發展道路。消息傳來，正

在黑暗中苦苦探求國家前途命運的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找到了一條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他們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中發現，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勝利，是因為俄國的工農大眾集合在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是因為俄國有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於是，他們開始如飢似渴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不遺餘力地推介與宣傳馬克思主義，決心以俄為師，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西方傳過來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古老的中國落地生根，並且綻放出燦爛之花，除了它本身的科學性之外，還因為它主張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十分契合中國人從老子、孔子到孫中山一直所期盼的「大同社會」理想。就這樣，這些中國的先進分子率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十月革命道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中國的無產階級最早產生於 19 世紀中葉的外國在華企業，隨後又出現在洋務運動的官辦企業和隨之興起的民族資本企業中。到 1914 年的時候，已經達到 100 萬人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列強忙於在歐洲廝殺，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為中國民族工商業提供了發展的機會，中國的工人階級也由此有了進一步的壯大。到 1919 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的產業工人已有 200 萬人，這就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提供了深厚的階級基礎。

二、開天闢地的歷史事件

從 1919 年 1 月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取得勝利的 27 個國家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也派代表參加了巴黎和會。然而，會議卻被美、英、法、日、意等國所操縱，中國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不但遭到拒絕，而且會議竟然規定將德國在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使中國人民積蓄已久的反帝愛國情緒如火山般爆發出來。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學等 13 所大專以上學校的學生 3000 餘人齊集天安門示威，要求「外爭主權，內懲國賊」，以學生鬥爭為先導的五四愛國運動由此爆發。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很快發展到全國的各個階層，從 6 月 5 日開始，上海工人自發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幾日之間達到了六七萬人。隨後，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罷工，運動的主力由學生轉變為工人，這也標誌着工人階級從此走上中國政治的舞台。

五四運動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與以往的農民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啟發了人民的覺悟，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五四運動後，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認識到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他們脫下長衫，深入到工

人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思想感情發生重大變化，逐漸站到工人階級立場上來，實現了知識分子的無產階級化，與此同時，一批工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後提高了階級覺悟，這就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有機結合。在此基礎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重要性，開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組建工作。

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員有陳獨秀、李達、俞秀松、李漢俊等，隨後還擬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同年10月，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等在北京成立了「共產黨小組」。在這之後，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漢，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在廣州，以及日本、法國的留學生和華僑中，也相繼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這些共產黨早期組織中，由於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崇高威望和上海作為中國最大城市的便利條件，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起到了聯絡中心的作用。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積極開展工人運動，領導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大力開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與宣傳，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一步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當時，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十分關注。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科爾斯基先後來到上海，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了聯繫，雙方一致認為應儘快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

成立中國共產黨。隨後，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給全國各地和旅日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寫信，請其派代表來上海參加黨的成立大會。

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匯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在這裏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會場受到暗探的注意和租界巡捕的搜查，會議的最後一天改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舉行。參加會議的共有來自7個地方的13名代表，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上海早期共產黨組織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此時正在廣州，派遣包惠僧作為代表參加了會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了會議。

黨的一大的中心任務是討論正式組黨的問題。會議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提出黨的奮鬥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在中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人從此確立了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綱領中還包含一些屬於黨章性質的條文，如規定承認本黨綱領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黨員的人，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但在入黨之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繫；新黨員入黨後為候補黨員，必須接受黨組織的考察，考察期滿後經多數黨員同意，始得被接收入黨；等等。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從此，中國有了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無產階級政黨，長期在黑暗中探索的中國人民自此有了閃亮的指路明燈，在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中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了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

三、黨的二大與工人運動的勃興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十分注重實際鬥爭的開展。1921年9月，黨在上海成立了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創辦了機關刊物《勞動周刊》。接着，又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建立了分部。1922年5月，黨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農村工作也開始起步，黨的一大之後，就有黨員在浙江蕭山縣的衙前開展農民運動，組織農民協會。黨還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

黨的組織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一些地方新建立了黨的組織，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也與黨中央取得了聯繫。此外，在留德、留俄、留美學生中也發展了黨員或建立了黨組織。到1922年6月底，全國黨員人數已由黨的一大時的50多人

發展到了 195 人。

1922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制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黨的二大明確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現階段的革命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是一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第一次把黨的長遠奮鬥目標與現階段的實際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它表明，只有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才能為中國革命指明正確的方向。大會通過的《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黨的一切活動都必須深入到群眾中去，黨的內部必須有嚴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紀律的組織和訓練。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這是黨的歷史上的第一部黨章，對黨員的條件、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黨的二大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強調無產階級是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世界的，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決定正式加入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確實曾有過許多正確的指導和有益的幫助，如推動創建中國共產黨、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大力聲援五卅運動等。但與此同時，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共產國際實行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也容易束縛中國共產黨的手腳，使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獨立自主

地決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當時在處理複雜的國共關係問題上，不能根據形勢的變化採取切實可行的應變措施。而且共產國際遠離中國，對中國的具體情況不可能都很了解，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也容易將俄國革命的經驗套用到中國。因此，黨在大革命後期曾出現過的右傾錯誤和土地革命前期、中期曾出現過的「左」傾錯誤，都與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有關。當然，革命經驗的積累需要一個過程，黨在後來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逐漸認識到了獨立自主的重要性。

黨成立後的一段時間，年輕的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了工人運動上，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夜校，領導罷工鬥爭。各地黨組織相繼領導了上海英美煙廠、粵漢鐵路武（昌）長（沙）段、漢口租界人力車夫等罷工鬥爭，黨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日益擴大。1922 年年初，香港海員為了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在蘇兆徵、林偉民的領導下舉行了長達 56 天的大罷工，並取得了勝利。以此為起點，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全國共發生了大小罷工 30 餘次，參加罷工的工人人數在 30 萬人以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 1922 年秋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2 年 10 月開始的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以及 1923 年 2 月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這些罷工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黨在領導一系列的罷工過程中，密切了同工人階級的聯繫。在鬥爭中，一批工人領袖成熟起來，先後加入了黨的隊伍，黨在工礦企業中的基層組織也開始建立。